

四、战争与政治

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」，这是克劳塞维慈氏的名言，根据克氏的意见，战争为政治的手段，用以贯澈政治目的之手段。前面说过，国父是受着克氏学说的影响的，但克氏是为战争而战争，却不问政治目的的好坏，国父却是为革命而战争，有着伟大的政治理想，这是国父比克氏进步得多了。近代战争是要求政治家要懂得军事，军事家要懂得政治，否则，便不能密切配合，尤以军事是政治的一部门，为政者非懂得战略不可。国父是一个政治家，也是一个军专家，这是他伟大的所在，也是我们的楷模。

内政与外交为政治的两大形态，关系战争的胜败所在。倘若内政与外交俱不配合战争，甚至背道而驰，非导致战争失败不可。在这里，我且把国父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言论亦即战时政治的言论，分为内政与外交两方面来研究。

一、内政方面

战争所要求于内政，最要紧的是举国团结一致。因为举国上下及各党各派团结一致，才可以构成强大的力量，协助战争，支持战争。国父说：「中国现在时势，在危险时代，如各自为谋，不以国家为前提，无论外人虎视眈眈，瓜分之祸，危在眉睫。即使人不我谋，而离心离德，亦难有成。是中国欲建巩固之国家，非万众一心，群策群力，不足以杜外人之觊觎。」（「谋建设须扫除旧思想」讲词）又说：「大敌当前，而内纷不息，事甚无谓，文已电同志，俾泯猜虑，并求事实上之一致。……务严约束，勿复生衅，庶几同心戮力，共伸天讨。」（「致岑春煊协力讨袁电」）同样在对外战争时，更要促成国内的团结一致，能如是，方不致发生无谓的磨擦，以互相抵销，更不会被人挑拨离间，以自相分裂。国父于民元目击帝俄侵略我外蒙古，便发表钱币革命通电，主张对俄抗战说：「故举国一致，誓死靡他也。」这真是我们今日反共抗俄的箴言。

「足食」、「足兵」亦为战时内政的要项，关于足食方面，留待下篇论述。关于足兵方面，在反共抗俄的今日，亟应实行国父向所主张的「征兵制度」，做到人人能战，使台湾成为一个现代「斯巴达」。

要之，不管为谋举国一致，或足食足兵，在内政上首要树立「万能政府」（见「民权主义」，为民主政治的核心），以为领导和推动战争。又战争所需要全国人民的「有力出力」，「有钱出钱」，「有物出物」，更要有取得人民信仰与拥戴的「万能政府」。要之，战时内政至为繁重，措施的适宜与否，往往足以影响战争的胜败，国家的兴亡。所以一个战时政府是不能充斥着无能之辈，贪污之流的。其次，战时政府是要实行集权的，人民的一切都要受其管制。（但在今日民主时代，应有限度的）国父说：「譬如次之世界大战，凡参加此战争之国，无论共和君主，皆一律停止宪政，行军政，向来人民之行动自由，言论自由，集会自由，皆剥夺之，并且饮食营业，皆归政府支配，而举国无有异议，且献其身命为国家作牺牲，以其目的在战胜而图存也。」（「孙文学说」第六章）

二、外交方面

外交与军事本为「难兄难弟」，在战争未爆发之前，外交可代替军事，战争一经爆发之后，外交就要协助军事。第一次欧战方酣之际，南非斯末资将军曾说过：「这次战争不仅是单纯的武力角逐，如果我们要把握住最后胜利，我们必须运用外交，如运用其他国力一样。当我们协约国达到满意的和平时，我们最高理想的实现，不仅依赖军事行动，还须凭借外交利器。」战时外交的重要性，于此可见。在普法战争中，普之胜法，固胜于色当一役，亦由于俾士麦和英联奥及对俄调协，使法国陷于孤立，以协助军事。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，意之胜英，虽胜于苏费立倭一役，亦由于加富尔运外交手段，联法联英，及对普亲善，得以全力对付奥国，这是两大显著的例证。

国父是一个大革命家，也是一个大外交家，彼在推翻满清的革命战争中，奔走海外，联络友邦，用能博得国际同情，取得国际援助。当在美国听得武昌起义的捷讯，本拟由太平洋潜行返国，亲与革命之战，继念「吾党尽力于革命事业者，不在疆场之上，而在樽俎之间，所得效力更大也。」（「自传」）遂起程赴英，向英政府要求三事：一、停止清廷一切借款，二、制止日本援助清廷，三、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，以便归国。此三事均得英政府允许，方取道法国东归。民国以来，于讨贼各役中，亦莫不运用外交以佐之，借孤奸贼之势，并取得国际间

的援助。又如民十二在广州收回关余，以充北伐经费，北京使团竟令外舰集中省河，百端恫吓，国父从容应付，据理力争，卒达目的。民十三广州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利用商团公然叛变，英领且为张目，致国民政府以哀的美敦书，阻止政府戡乱，国父乃向英政府提出抗议，卒使英舰不敢妄动，而英领亦因此去职。还有民十二由于联俄，亦促进了北伐初期的发展。

以上是国父外交战成功的事实。其次国父欲本其外交知识经验，著作「外交政策」一书，虽未完成，而关于外交言论，散见于遗教中颇多。民族主义第五讲说：「用政治力亡人国家，本有两种手段：一是兵力，二是外交。兵力是用枪炮，他们用枪炮来，我们还知道要抵抗，如果用外交，只要一张纸和一枝笔，用一张纸和一枝笔，亡了中国，我们便不知道抵抗。在华盛顿会议的时候，中国虽然派了代表，所议关于中国之事，表面都说为中国谋利益，但是华盛顿散会不久，各国报纸便有共管之说发生。此共管之说，以后必一日进步一日，各国之处心积虑，必想一个很完全的方法来亡中国。他们以后的方法，不必要动陆军，要开兵船，只要用一张纸和一枝笔，彼此妥协，便可以亡中国。如果动陆军开兵船，还要十天或四五十天，才可以亡中国。至于用妥协的方法，祇要各国外交官，坐在一边，各人签一个字，便可以亡中国。签字是一朝，所以用妥协的方法来亡中国，只要一朝。一朝可以亡人国家，从前不是没有先例的，譬如从前的波兰，是俄国、德国、奥国瓜分了的，他们从前瓜分波兰的情形，是由于彼此一朝协商妥协之后，波兰便亡。照这个先例，如果英、法、美、日几个强国，一朝妥协之后，中国也要灭亡。」这是说军事与外交同属政治力的手段，而其「不战而屈」的外交手段，尤为可怕。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的讲词里就革命战争的中外交说：「革命的成功与否，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起来，一靠武力，一靠外交力，外交力帮助武力，好像左手帮助右手一样。从前美国独立，革英国的命，所以成功的原因，一半固然由于本国武力的血战，但一半可以说是由法国外交力的智助。如果专靠武力，决是难于成功的。譬如洪秀全革命，由广西打过湖南、湖北、以至建都南京，而终不能成功的原因，大半是由于外交失败，没有外交力的帮助（致招英国戈登帮助满清亲自带兵去打苏州——浴日注），所以革命的成功与否，外交的关系是很重大的。」至于军事的进展亦足以给予外交有利的影响。国父自美洲致邓泽如先生的信说：「经羊城一役之后，外交亦易入手。弟曾著人直说美国政府，皆大表同情。今已使人往英，以说彼中权要，想必能得当。法国政府，

则向已有通情者也。如是吾党今日可决英美法三国政府，必乐观吾党之成事，则再举之日，必无借端干涉之举，且必能力阻他国之干涉也。此又外交之路，因羊城之影响而收效果者也。」

国父认为外交在对外关系上是很重要的，又认为一国对外应先用外交手段，然后用战争手段，亦足见维护国际和平的精神。他说：「国家既不可以长从事于战争，而对外国之关系则有日增无日减。于此关系日密之际，不能用战争以求达其存在发达之目的，则必求其他之手段，所谓外交者由是而发生。凡国家之国策既定，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。外交手段既尽，始可及于战争，战争既毕，仍当复于外交之序。故国与国遇，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，均为行其政策所不可阙者。然用外交手段之时多战争手段之时少，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轨则，战争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。不得已云者，外交手段既尽，无可如何之谓也。」这个外交思潮，正渊源于孙子所说：「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」于此我们要注意的，不论在平时或战时，为求外交的胜利，须以国内的一致团结为基础。国父说：「夫欲求外交之胜利，必先谋内政之修明。今内部既分裂如是，何能得国际之承认。……倘西南各省，一致拥戴军政府，承认大元帅，则国内团结既固，对外发言效力自强，断不患外交团之否认，及交涉之不胜利也。」（「致贵阳王文华、刘显世电」）又说：「外交恃内政，内政要是好，外交简直不成问题。」（「学生要努力宣传担当革命的重任」讲词）又说：「内政不清，外交益多荆棘。有谓外交运用得宜，则内政可徐图改善者，此实未窥见外患之来，由于内隙耳。」（「覆王廷论外交与内政关系函」）可见两者的关系。

国父在外交上一向反对满清时代李鸿章所采取的「以夷制夷」政策。（「中国存亡问题」）他所厘定的民二国民党政见宣言说：「外交微奥，有应事发生者，未可预定，亦难说明。」却很具体地提出两个基本方针：一曰联络素日亲厚与国，（亦即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奋鬪」）一曰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。该宣言说：「惟外交方针，则可约略言之：一曰联络素日亲厚与国：今国于世界，孤立无助，实为险象。故必当联络素日亲厚之与国，或缔协约，或结同盟，或一国，或数国，俱为当时之妙用。一曰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：吾国现势，非致力对外之时，故宜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，使之相承不变，而得专心于内政之整理。」亦即前者为与利害相关的国家结成同盟，以取得

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援助。后者为维持中立国家素日对我所采取的公平主义，如尊重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，维护我国之反抗侵略运动等，使之相承不变。惟在反共抗俄的今日，不只要维持之，还要发展之，我们应利用外交来孤立敌人，增强自己，促进战争的胜利。

其次，为使外交运用得宜，争取外交战的胜利：第一、要明了情况：民二国民党政见宣言说：「当吾国之积弱，非善用外交，不足以求存。然欲运用外交，非具世界之眼光，不足以尽其用。中国向来外交，无往而不失败，盖以不知国际上相互之关系，一遇外人虚声恫吓，即惟有让步之一法，是诚可伤心者也。」尤以办理战时外交，更要洞识当时各国千变万化的实情，及国际间复杂错综的利害关系，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的外交情报网，以求「知己知彼」，才能确立有效的对策。

第二、要争取自主：一国的外交，不宜媚外，亦不必畏外，不宜盲从人家，亦不可附庸人家，一定要独立自主，尤以战时外交为然。正如国父说：「操之在我则存，操之在人则亡。」（「中国存亡问题」）方能操纵自如，争取胜利。又说：「国于天地，必有与立，彼不能保其自主之精神，何取乎有此国家乎？……中国欲于此危疑之交，免灭亡之患，亦惟自存其独立不屈之精神而已。」（同）又说：「吾国外交本非自主，向落人后，而又不能研究其利害与得失之所在，殊可叹也。今后吾国之外交，对于海军国，固当注重，然对于欧亚大陆之俄德二国，更不能不特殊留意，不宜盲从他国，致为人利用也。」（「外交上应取的态度」谈话）又说：「中国一般普通人的心理，以为外国人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必须要中国有力量，如果中国一日没有力量，那些旧约便一日不能废除。这个道理，殊不尽然。要问外国能不能废除旧条约，就要问我们有没有决心去力争。如果大家决心去力争，那些条约便可以废除，好像最近的华盛顿会议，外国人便主张放松，从前的凯马契约，外国人也主张实行。我们中国人都是不争，都是不要。假若全国国民一致要求，这种目的，一定可以达到的。」（「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」讲词）其强调外交自主的精神可见。我国过去抗战的外交，即由于能够发扬国父这个遗教，独立自主，坚持自己的立场，不行中途妥协，故能争取最后的胜利。在今后反共抗俄的战争中，更应如此。

第三、要把握利害：国与国间的分合，系以利害为前提，其合由于利害的相同，其分由于利害的冲突，绝不是感情道义所可维系，必须

有着利害关系，然后才有感情道义可言，尤以战时外交为然。英国人说：「英国无永久之友，亦无永久之敌，只有英国之利益。」孙子说：「屈诸侯者以害，役诸侯者以饥，趋诸侯者以利。」真是道破外交的真形。国父在外交上向重信义和道德，但对现实的外交则重视利害。他说：「夫两国之联盟，匪以其条约而有效者也，真正原因，乃在其利害之共同。英国本无急切与德冲突之必要，业如前章所已言。此次交战，既不能摧抑最强国之目的，英国为保其存在，不得不弃所欲得之利益，以保其所已得之利益，而德国苟以英国之助，得其所欲得之利益，即为利害共同，而联盟之事自生。譬诸意大利，本与法为近属，且得法之助以立国。而一旦争非洲北岸之地，与德英有共同利害，则加入三国同盟以敌法。及其战土以后，利害与奥冲突，而对法缓和，则又复活其同种之感情，与建国之旧恩。故知国际恩怨要约。两不可恃。同种云者，亦不过使利害易共同之一条件，其他感情上之事实，随时而变更，非可规律久远之政策也。欲两国之真正利害共同，必能有割舍之决心。所谓协调者，各着眼于永久之计划，于将来两国发展所必须者以交让行之。……世人有疑此者，请视日俄，日俄以倾国之力相搏，事才十截，日俄之宣战，距朴资茅斯条约，不过八年有余，日俄媾和之际，吾在东京，亲见市民狂热，攻小村和议特使为卖国，以桂总理为无能。焚警舍，击吏人，卒倒内阁，舆论未闻有赞成和议者，曾几何时，而人人以狂热欢迎俄人之捷报。夫感情随事而逝，亦随事而生，一国当时之外交，必决诸恒久之利害，决不能以暂时之感情判之，以日俄之前事，可以判英德之将来矣。」（「中国存亡问题」）再说：「大凡立国必须与利害相关之国，携手进行，方能进步，利害不相关之国，纵彼欲与我相亲，但是不可以与之亲近者。从前满清政府……不知利害相关的道理，纯是远交近攻之政策。……一经亲俄，天山以西帕米尔高原一带，已非我有，延至今日，蒙古又将不见了，这就是利害不相关之国相亲之害。……今日谋巩固中华民国，必须注重外交。」（「学生须以革命精神努力学问」讲词）所以我们在现实的外交上，一定要透视和把握着彼此间的利害，依此而讲求应付之方，自可迎刃而解，尤以战时外交为然。

最后，近世以来，世界各国的善用外交者，莫如英德，英国在第一次欧战中，既把德国的盟友意大利拉过来，又把中立国的美利坚卷入漩涡，并肩作战，卒收战胜之果。但在二次欧战之初，因对俄外交的失败，使德国得以大胆发动西线之战，而自己遂罹重大的损失。

德国在二次欧战中，既联意以制法，又联俄以避免东西两面作战之苦，而得集中力量解决西线各国，旋转锋攻俄，欲求速战速决，但因赫斯飞英的失败，遂使攻俄之战一败再败，至于亡国，于此，足见战时外交运用的困难，但根本的原因，实由他们外交政策的错误，弄至无法补救。今日我们反共抗俄，国际形势虽是对我日益有利，但我们还要善用外交，外交将给予我们无限的助力，外交将促进我们战争的胜利。